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八〇期 ——
(二〇〇七年六月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706d)

【本刊专稿】1967：军队介入铁路系统过程述略	余汝信
【研究动态】注意和警惕来势不小的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潮	阎长贵
【往事回首】江青在钓鱼台居住时的一些情况	杨银禄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本刊专稿】

1967：军队介入铁路系统过程述略

• 余汝信 •

本文以1967年军队对动荡中的国民经济大动脉——铁路系统的介入过程为例，试图寻找出解答文革前期有关军队若干问题的线索。这些问题包括：“三支两军”局面的形成过程；毛泽东通过什么渠道掌控军队的“三支两军”？周恩来对军队的实际控制能力；国防军（野战军）在平定乱局中的作用，等等。

一、混乱的一月

1967年1月，毛泽东所肯定、以上海为源头掀起的向党内走资派夺权的“一月风暴”，迅猛席卷全国。

1月13日，铁路系统革命造反派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铁路系统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誓师大会”。周恩来不得不顺应形势，他在大会上称：“在铁路战线上代表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铁道部门的少数领导人。所以在你们的铁道部门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应该集中力量彻底批判吕正操、武竞天这些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的罪行！”（1）

不过，周恩来在讲话的下半部分，倒还是对吕、武留有余地。他又称：“现在还剩一个问题，铁道部长怎么办？三天前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和我与北京大学造反派也有一部分保守派谈了话，我们宣布了这个事。我们说尽管吕正操、武竞天犯了这些罪行，我们还给他们一个机会，给他们一个最后机会，看他们能否将功赎罪，看他们能不能改。我们向你们呼吁！允许我们国务院给他们十天到一个月的工夫，最后机会，看他们是否能将功赎罪。所以我向你们提议，不要你用你揪我抢的办法，这样形式上好像是打击了他，实际上他得到了休息。”“我再向你们提议，住在铁道部的无论如何要让他出二层楼办公的地方，让铁路恢复指挥系统，你们可以派一部分代表，组织一个管理委员会来监督他们的工作好不好？（众：好！鼓掌）使他们没有任何借口，给他们一个时期，不要东揪西抢，你推我打，让他们做一个月工作，看他们能否将功赎罪。”（2）

1月21日凌晨，周恩来接见铁道部“东方红公社”等组织。周恩来称：“在这十天当中，抓革命、促生产，先把部内革命造反派组织起来，经过协商，成立领导小组，造成革命气势。”“铁道部本身要把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监督生产筹委会，主要是监督生产。”“第二件事就是要把全国铁路的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有路局、工厂、工程局、院校，部机关也要参加进去。”（3）

夺权的迅猛态势，并不是周恩来所能预料。就在他讲话后的第二天，1月22日上午9时，铁道部“东方红公社”突然宣布全部接管铁道部的一切党政权力。“东方红”宣称：“立即联合各革命造反派组成铁道部革命委员会”，并要求“机关各局（委、处、室）要相应组成局（委、处、室）革命委员会”。同日，“东方红”负责人张茂指定由铁道部与外单位共二十三个群众组织，组成铁道部革命委员会筹委会。

然而，“东方红”的夺权不但没有得到中央的肯定，更遭致部内外其他造反派组织的抵制。1月24日，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贴出大字报，指“东方红公社”单方面接管铁道部党、政、财一切大权，是改良主义的假夺权，宣布退出“筹委会”。首都革命职工造反总部铁路分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铁路联合指挥部等二十四个铁路群众造反组织以及十三所大专院校、中学红卫兵组织发表特急联合声明，强烈抗议“东方红公社”单方面接管铁道部，宣布“东方红公社”发出的接管铁道部《公告》无效，倡议铁道部所属各单位造反派另行联合接管铁道部。

1月25日，“东方红公社”批斗了吕正操、武竞天。又假借铁道部政治部名义，从铁道兵请来了一车全副武装的军人进驻铁道部大楼，以壮声威。

次晚，周恩来在国务院接见铁路系统各单位革命造反派代表数十人。周在讲话中指责“东方红”：“请铁道兵是完全错误的。矛盾增加了，使矛盾复杂化了。这件事应该让我知道嘛！……我命令铁道兵马上撤回。‘东方红公社’签发的关于精简下放职工回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是错误的，是把矛盾上交，应该取消。”还称：“铁道部与别的企业不同，确实有两重性，不仅铁道部机关，如果不能把基层主要单位联合起来，铁路运输也不能保证。”

1月27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再次接见铁路系统各单位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周恩来称：“张茂在夺权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必须认真检查。……你们要成立一个业务小组，要值班，立即就推选，保证业务不中断。……第二件事，就是要筹备全国铁路系统革命造反筹备联络组。”

“东方红公社”一派单方面请来铁道兵，从常理上说的确可能使矛盾复杂化。惟周恩来对此事的批评，却似乎与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有别。毛泽东1月21日即对南京军区党委就造反派要求安徽省军区派出部队警卫会场的请示报告批道：“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4）

为什么毛泽东令安徽可以派出军队支持“真正革命派”，铁道兵就不能派出部队支持“东方红公社”呢？难道周恩来能断定“东方红公社”就不算“真正革命派”？

此外，周恩来说要筹备“全国铁路系统革命造反筹备联络组”，既不现实，亦与半个月后中央的政策相抵触。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告，宣布“所谓全国性组织，中央一律不予承认，所有这些组织应当立即取消。”〔5〕“全国铁路系统革命造反筹备联络组”当然属于“全国性组织”之列。可见，在一月夺权的急风暴雨中，即便作为中共第三号人物的周恩来，也难以有效约束国务院系统内造反派的所为，难以跟得上毛泽东瞬息万变的“战略部署”。故而，难免就有些顾此失彼，进退失据。

二、军管提上议事日程

铁路系统本为一准军事化的组织系统，又是全国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失控，影响非同小可。实际上在1月下旬，铁路系统已发生过重大事故。1月23日，308次旅客列车在沈阳站冒进信号，与正在通过的54次旅客列车侧面冲突，死29人，重伤17人，轻伤81人。铁路上行线中断行车1小时22分，下行线中断行车9小时15分。〔6〕

2月1日凌晨4时，周恩来接见铁路系统部分群众组织代表时声称：“我不愿意军事管理”，“从今年2月1日起，以往的事再不要提了，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希望‘二七’那天能见到你们的大团结。”要求派系林立的铁路系统群众组织“二七”即六天之后就实现“大团结”，显然是天方夜谭。周口头上说是不愿意军管，却正表明军管的手段已在周的考虑之中，惟可能因为未得到毛泽东的最终认可，故而，周才将其说得有点模棱两可。

需要说明的是，铁路系统并非是较早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据周恩来3月13日在军级以上干部会议讲话时称：“军事管制问题，到二月中旬，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六千九百多个，大都是公安、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监狱等单位，其中仓库、银行占很大数目，仓库三千一百多，约占一半；银行一千四百多，约占五分之一。根据毛主席批示，各级银行都要军事管制，将近七千个军管单位，已经用了团的兵力。

“现在军事管制从地区上看，只达三分之一。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市），已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海、山东。”

周在这次讲话时还提及：“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和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新阶段。夺权斗争是由上海推动起来的。夺权斗争的发展虽然不算很快，但也不算慢。但是在这个阶段中，不少地区（有一半），不少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由于无产阶段革命派还没有旗帜鲜明地联合起来，有的革命组织转化了，有的两方都是革命派，但不联合，甚至争论不休，发展到武斗，当权派干部没有挺身而出，没有检讨自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这样就使当地的军事领导机关无从支持和参加革命的‘三结合’夺权。这些单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或者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或边防、沿海，或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或专政机构，或机密要害部门，或国防企业事业单位、国防工厂、仓库等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7〕

3月5日，齐齐哈尔铁路局所属昂昂溪车站，因引导员、扳道员在工作时间辩论争执，忘扳道岔，盲目接车，造成383次旅客列车与020次货物列车侧面冲突的重大事故。机车大破一台，货车损坏八辆，正线中断行车6小时10分。〔8〕

3月19日，毛泽东对《齐齐哈尔铁路局运输状况严重混乱》材料作出批示：“林彪、周恩来同志：此件请阅。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一切好的铁路局，也应派出军代表，吸取那里的好经验，以利推广。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此事请研究酌处为盼！”〔9〕

毛的批示，明确了铁路军管问题。批示是给林、周两人的，惟具体措施，是周恩来落实的，目前尚未见有林彪参与的材料。

3月22日，周恩来与李富春、李先念等在中南海会议室接见交通、铁道、邮电三部群众组织代表共六十多人。周恩来在接见时称：“机关大联合都没有搞好，三结合还没有条件，三个部都不成熟，铁、交、邮刚由部外转入部内，铁道部三十三个组织观点不一致，两大派还要谈判协商。……”“经我们研究，铁路、交通、邮电要实行全面军管。主要物资设备、援外、国防、航空先军管。一月底，我的意见民航局归军队管。那样集中，但到真正实行军管时，有部分人拒绝不干，闹了几天，军事院校和工厂还是说服了，最初闹的人多，一天天闹的人就少了，闹了四五天没闹头了，最后不闹了。现在是三月份，不能再耽搁了。原来二月份又等了一个月，刚才大家鼓掌，可能是不会有意见。总之不能再推迟，无论如何二季度的生产要搞好。铁路、轮船、码头、汽车、港口、运输公司先搞大的，邮政先搞省会、直辖市，大的港口，至于地方还可根据需要，实行军事管制。派军管小组或委员会，由谷牧同志负责。军管的目的是过渡的办法，还是要实现大联合，三结合。”〔10〕

三、铁路系统军管的实施

3月28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碰头会，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关于铁道、交通、邮电部门实行军管的决定。〔11〕

至1967年5月，铁路系统大部实行军管。全国十八个铁路局，军管了十个，即齐齐哈尔、吉林、锦州、北京、呼和浩特、柳州、成都、西安、乌鲁木齐、昆明铁路局。五十一个铁路分局，军管了二十七个。〔12〕

惟对铁道部部机关军管的实施，延至5月中旬方得以落实。5月19日晚，周恩来接见铁道部临时业务监督小组（1月29日成立）全体成员和部机关两派群众组织——机关革命造反总部和联络总站的代表。周指出，联络总站造业务监督小组的反是错误的，并宣布，将对铁道部实行军事管制。陪同周恩来接见的，有总参军务部部长苏静（拟任铁道部军管会主任），总参军事交通部副部长杨杰（拟任部军管会副主任），这是苏、杨在铁道部的首次亮相。〔13〕

5月20日，杨杰在铁道部主持会议，传达将铁道部西南工程指挥部移交铁道兵问题。此后数日，拟派驻部军管会的多名军队干部，听取了各群众组织关于部内文革情况的汇报。

然而，铁道部军管事关重大，必须得到毛泽东的最终点头同意，至5月31日，周恩来再接到国务院联络员办公室报告：郑州、徐州、蚌埠、金华、宣化等铁路枢纽站段因两派武斗，炸毁机车，停止作业，致使京广、津浦、陇海、浙赣等四条主要铁路干线均处于瘫痪状态，仅徐州一处就停开货车六十九列。周恩来当即批示同意济南军区68军党委常委关于要求对徐州铁路分局和火车站实行军管的急电（时陆军第68军军部驻江苏徐州市，负责徐州地区“三支两军”事宜）。中午，周到毛泽东处，说明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一旦中断，国民经济局势不可收拾，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的问题不可再拖。毛泽东表示同意。〔14〕

综合以上材料分析，关于对铁道、交通两部军管问题的文件，应在毛泽东处压了相当一段时间。

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对铁道部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于5月31日正式发布。《决定》共八条，其中第一、四条称：“一、为了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真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根据毛主席关于‘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以及‘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等重要指示，特决定自即日起对铁道部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军管会），任命苏静为军管会主任，杨杰、朱互宁为副主任。”“四、军管会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对部的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部属单位无论是否实行军管的，均受部军管会的领导；分散在各地的单位，同时受所在地革命委员会或军区的领导，但有关生产运输调度业务，必须服从部军管会的集中指挥。”（15）

与对铁道部军管决定同日发布的，还有同样是毛批示“照办”的对交通部军管的决定。该两部是国务院系统最早实施军管的正部级单位，其军管经验对随后国务院各部相继军管起到了启迪、示范作用。担任铁道部军管会正、副主任的总参系统军队干部苏静、杨杰、朱互宁，日后亦深得周恩来的信任和倚重。

苏静（1910—1997）时为兵团级的总参军务部部长。曾长期在林彪麾下担负司令部参谋组织领导工作，历任八路军115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作战处处长，四野暨中南军区副参谋长。1952年起任总参军务部部长，1955年授中将军衔。1968年后，调任国家计委、国家物价委员会、国家统计局三单位军事代表，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国务院政工小组负责人，国家计委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为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1988年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杨杰（1921—）时为副军级的总参军事交通部副部长。建国后历任西南军区司令部军交处处长，总参军交部处长、副部长，1960年晋升大校军衔。1968年苏静调离后实际主持铁道部工作。1970年1月，铁道部军管会与交通部军管会合署办公，6月，交通部、铁道部、邮电部的邮政部分合并组成新的交通部，任交通部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5年回部队，先后任总参管理局政委，基建工程兵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建工程兵副政委，1987年离休。

朱互宁（1924—）到铁道部军管前，为总参作战部空军处处长。到铁道部四个月后，1967年10月4日，仅为师级干部的朱互宁被中共中央任命为驻冶金部军代表，主持冶金部工作。1970年6月，任冶金部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3年7月调回部队，1979年后历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副院长。

朱互宁调离铁道部后，1967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韩卫民（总参军训部副处长）为铁道部军管会副主任。

四、从军管到国防军护路

5月31日下午，在毛泽东最终同意对铁道、交通两部实行军管后，周恩来召集李富春等开会，商定对策。会后，周恩来去函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

“送上铁路中断情况电讯八份，请阅。今午在主席处，已说明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交通命

脉，绝不能中断。下午曾约集富春、先念、剑英、萧华、成武、谷牧、秋里各同志会商此事。除以报请批发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命令外，并拟将全国18个铁路管理局分给附近驻军实行军管包干，将沿海沿江轮运交海军包干，均与当地军分区、武装部分开，不再介入地主支左工作，以便统一全国铁路轮船运输，免受干扰。这一计划正由总参草拟，明日当可订出送审。

“此外，拟为此事再发一告铁路轮船职工书，定稿后再送阅。

周恩来

五月三十一日”（16）

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发出《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该《命令》第三条称：“煽动武斗、破坏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和砸毁铁路、交通设施、运输工具的少数坏人以及情节严重的肇事者，必须受到无产阶级国家法律的制裁。各地革命委员会、军事管制委员会和驻铁路、交通部门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军代表、公安值勤人员有权根据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公安六条规定负责处理上述问题，有关方面必须听从，不得拒绝执行。”（17）

同日，军管会正式进驻铁道部。原部临时业务监督小组改为军管会业务协助小组。

6月5日，周恩来召集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文件之一，为《对铁道部实行全面军事管制的部署（草稿）》。（18）

6月12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全国铁路实行全面军管。（19）

铁路系统由站点及线路构成。所谓“全面军管”，由于派出军管人员数量所限，亦只能管到“点”（包括铁道部机关、铁路局、分局机关、主要枢纽、车站）上，却未能全面铺开解决“线”（至少是主要铁路干线沿线）上的问题。而即便在“点”上实施了“全面军管”，7月，京广、宝成、浙赣、湘桂、沪宁、长大等铁路干线，仍由于两派群众组织发生冲突而一度中断运输。在此严重情势下，7月下旬，周恩来不得不使出了最后一招——派出国防军（主要为陆军野战部队）护路！周亲自拟定详细的国防军部队护路部署，送交仍在南巡途中的毛泽东，经毛批准，8月10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联合发布了《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用明码电报方式向各大单位传达。

8月10日《命令》全文，详见本文附录一。因当时保密的需要，《命令》第一部分“任务区分”在下发时大都略去，故而极为少见，本文附录已恢复其原状。“任务区分”涉及陆军二十七个野战军，占当时三十一一个野战军的87%。另四个陆军师，空军一个空降兵军，总后一个军级办事处，铁道兵一个军级指挥所，三个铁道兵师。《命令》中所用当时部队代号与番号的对照表，详见本文附录二。

《命令》是给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并8172部队、7250部队”的。为什么特别要注明“并8172部队（即陆军第1军）、7250部队（即空降兵第15军）”？笔者推测，恐怕是因为武汉军区在“七二〇事件”后刚改组不久，而该两军所驻河南、湖北地处中原，位置十分重要，为使《命令》直接到位，方有此非常举措。

《命令》虽涉及三十个军级单位，七个师级单位，惟这些单位的实际派出兵力，据后来军方的统计，则为“至9月中旬，全军共派出了2个师部、6个团、28个营、190个连、4

3个排、33个班，分别配置在191个主要车站和110对旅客列车上，执行维护铁路交通秩序的任务。”〔20〕

五、简短的结语

（一）“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自1967年1月下旬始。此际，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级，中央对学生、工人造反派渐失控制，中共各级组织和政府、公检法机关相继瘫痪或半瘫痪，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交通堵塞，武斗成风。“三支两军”中的军管，多由周恩来提出，经毛泽东同意，相继对部分省、自治区、大中城市、电台、银行、仓库、监狱、民航、公安、报社、铁路局或分局、国防科研机构、沿海主要港口、大型水电工地等实行军事管制。据军方统计，在1967年的前五个月里，全国实行军管的单位共达7,752个，警卫保护单位2,145个，共计达9,897个单位，抽调军管、警卫重要目标兵力共计达14.4万人。〔21〕铁路系统，为军管的重要组成部分，至1967年6月，全国铁路实行全面军管，8月，国防军进入铁路沿线以维护铁路交通。

（二）虽然自1954年之后周恩来已没有任何军方职务，但其对军队仍然保持着影响力，文革中表现尤甚。周恩来往往直接参与“三支两军”尤其是支左、军管的部队部署调动、人员任用调遣，军事管制的具体部署，多由国务院系统提出，毛泽东批准，军事系统实施。至少在文革前期，毛泽东对周恩来在此方面是放心使用的，而林彪对周恩来采取了支持、合作的态度，使周在对军队及军队干部的应用上均颇为得心应手，未遇阻力。同时，至今我们未能看到林彪参与“三支两军”具体决策的有关材料，可以说，毛泽东更多地是通过周恩来而不是林彪去掌控“三支两军”。

（三）对铁路系统的军管至为艰巨，难以奏效。以至毛、周最后不得不动用最后一道杀手锏——国防军。但即便如此，武斗和混乱也仅限于收敛一时，未得根除。从1968年初至1969年中，徐州、衡阳、柳州、南宁、桂林、昆明、成都、西安、太原、晋中、晋南等地的铁路交通形势再度恶化，以至中央在1967年底至1969年中针对铁路运输相关问题发出一系列“通令”、“命令”、“布告”，如1967年12月2日《关于确保铁路运输物资安全的通令》、1968年2月6日《坚决打击破坏铁路运输的反革命分子的命令》、1968年7月3日“七三布告”、1968年7月24日“七二四布告”：1969年7月23日“七二三布告”，以至如“七二三布告”宣布对“负隅顽抗者”实行军事包围、强制缴械、追捕法办等严厉措施，至1969年下半年，全国铁路运输方可称正常。（2007年5月）

注释：

〔1〕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1）》（北京，1967.3），页111。吕正操，时为铁道部部长；武竞天，时为铁道部副部长。吕同时兼任军委铁道兵政委、总参军事交通部部长。

〔2〕同〔1〕书，页112。

〔3〕有关铁道部1967年初夺权经过及运动情况，参见铁道部机关革命造反总部编印《铁道部机关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油印本，1967.6）。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197。

〔5〕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室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汇集》（上海市党校革命工作委员会翻印，1967.5），页197。

〔6〕〔8〕〔19〕中国铁路史编辑研究中心：《中国铁路大事记（1876—1995）》（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1996），页298—299。

〔7〕《中央首长在军级以上干部会和军委扩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首都红代会北京政法公社、内蒙古党委红旗联络总部翻印，1967.9），页22—23。

- (9) 同(4)书, 页267。
- (10) 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1967.4), 页158—165。
- (1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页141。
- (12)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 页609。
- (13) 参见(3)书, 页21。
- (14) 同(11)书, 页158。
- (15)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7]165号。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福州军区政治部编印,1967.6), 页333—337。
- (16) 陈扬勇:《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页119—120。
- (17)《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福州军区政治部编印,1967.6), 页338—340。
- (18) 同(11)书, 页160。
- (20) 同(12)书, 页611。
- (21) 同(12)书, 页608。

◇ 附录一:

中发(67)241号 明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各大军区,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军事管制委员会, 并8172部队、7250部队: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 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切实保证铁路运输的畅通, 现决定派出部分国防军部队担负护路任务。部署如下:

一、任务区分

(1) 沈阳军区:

3135部队, 负责沈阳(不含)至山海关, 叶柏寿至赤峰, 高台山至平泉(不含), 和大虎山至通辽各段。

3096部队, 负责沈阳至旅大段。

3225部队, 负责苏家屯(不含)至丹东和沈阳(不含)至清原各段。

3167部队, 负责长春(不含)至图们, 哈尔滨(不含)至拉法, 图们至牡丹江(不含), 吉林至莲河(不含)各段。

3009部队, 负责沈阳(不含)至陶赖昭(不含)四平至通辽(不含), 郑家屯至丰库, 四平至辑安, 梅河口至清原(不含), 让湖路至通辽(不含), 哈尔滨(不含)至昂昂溪(不含)各段。

3026部队, 负责哈尔滨至陶赖昭、至绥芬河、至泰东, 牡丹江至鹤岗, 绥化至莲江口各段。

后字201部队, 负责白城子至昂昂溪(不含)、至伊尔施、至郭前旗、至太平川各段。

总字505部队, 负责昂昂溪至满洲里、至嫩江各段和大兴安岭林区各支线。

(2) 北京军区:

4 5 5 5 部队，负责北塘至山海关（不含）段。
4 6 8 8 部队，负责丰台（不含）至塘沽，天津至德州各段。
4 8 0 0 部队，负责石家庄（不含）至琉璃河和密云（不含）至平泉段。
4 5 8 7 部队，负责石家庄至德州（不含）、至榆次（不含）、至安阳（不含）各段。
4 6 1 8 部队，负责青龙桥——大同（不含）段和丰沙线。
4 6 4 2 部队，负责同蒲线、集二级和大同——乌达段。

北京卫戍区，负责北京市近郊区各段。

（3）济南军区：

6 0 6 3 部队，负责德州（不含）至蚌埠（不含）和连云港、郑州（不含）——潼关。
6 0 3 7 部队，负责济南（不含）至青岛段。
6 0 0 3 部队，负责蓝村（不含）至烟台段。

（4）南京军区：

6 4 5 3 部队，负责南京至蚌埠、至马鞍山（不含）各段。
6 4 0 8 部队，负责淮南线和芜湖至马鞍山各段。
6 4 1 0 部队，负责南京（不含）至上海段。
6 4 0 9 部队，负责上海（不含）至杭州、至鹰潭（不含）段。

（5）福州军区：

6 6 4 5 部队，负责南平（不含）至厦门段。
6 6 1 6 部队，负责南平至福州段。
6 7 0 3 部队，负责鹰潭至南平（不含）段。
6 0 1 1 部队，负责鹰潭（不含）至株州（不含）和向塘至九江段。

（6）广州军区：

6 9 0 0 部队，负责广州至深圳、至蒲圻（不含），和衡阳至冷水滩段。
6 9 7 5 部队，负责柳州至凭祥、至冷水滩（不含）至都匀，和黎塘至湛江各段。

（7）武汉军区：

8 1 7 2 部队，负责郑州至安阳、至武胜关段。
7 2 5 0 部队，负责武胜关（不含）至蒲圻，汉阳至丹江各段。

（8）兰州军区：

8 1 3 3 部队，负责兰州（不含）至潼关（不含）、至乌达（不含）、宝鸡至广元（不含）各段。
8 0 6 1 部队，负责兰州至西宁、至玉门镇、武威至干塘（不含）各段。

（9）成都军区：

7 8 4 8 部队，负责成都至广元、至资阳段。
7 7 8 8 部队，负责重庆至资阳（不含）、至石门坎和内江至安边各段。
8 8 1 5 部队，负责成都（不含）至甘洛段。

（10）昆明军区：

7 5 5 7 部队，负责昆明至河口、至凤凰山（不含）段。
7 6 1 1 部队，负责贵阳至石门坎（不含）、至都匀（不含）、至凤凰山段。
7 5 9 1 部队，负责昆明（不含）至广通段。

（11）新疆军区：

负责玉门镇（不含）至乌鲁木齐段。

各部队应在八月十五日以前进至所担负的任务地区。现在担负列车值勤的部队，除国际列车仍按原规定执行外，其它列车，按上述部署进行相应的调整。

二、铁路系统已实行全面军事管制，国防军担负护路任务后，对原铁路局、分局的军管会和站段的军管小组，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或改组，以便更好地实施统一指挥和领导。

为了密切配合，共同完成维护铁路交通秩序的任务，各站段的铁路公安人员，统归所在站段护路部队指挥。

三、担任护路任务的部队，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决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广泛深入的宣传和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和有关方针政策、命令、指示和规定，保证革命和生产双胜利。

四、铁路、交通运输部门的群众组织和革命职工，与铁路、交通运输系统以外的群众组织之间一律不许互相冲击。铁路、交通运输部门的群众组织，除中央特许者外，暂不参加本单位以外的群众联合组织，但可参加本地区的联合的政治活动，如革命的大批判。

外地、外单位的群众组织在铁路、交通运输部门设置的联络机构，必须撤出。铁路、交通运输部门各单位的群众组织之间，也不要互相设置联络机构。

命令的第四条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单独公布、张贴。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

（原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文件》（南昌：江西师范学院井冈山兵团铁军战斗队翻印，1967年9月），页192—196。已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核对更正个别错字。）

◇ 附录二：中发（67）241号文中部队代号与番号对照表

3135部队：陆军第40军
3096部队：陆军第39军
3225部队：陆军第64军
3167部队：陆军第46军
3009部队：陆军第16军
3026部队：陆军第23军
后字201部队：总后白城办事处
总字505部队：铁道兵大兴安岭林区指挥所
4555部队：陆军第24军
4688部队：陆军第66军
4800部队：陆军第38军
4587部队：陆军第63军
4618部队：陆军第65军
4642部队：陆军第69军
6063部队：陆军第68军
6037部队：陆军第67军
6003部队：陆军第26军
6453部队：陆军第60军

6 4 0 8 部队：陆军第 1 2 军
6 4 1 0 部队：陆军第 2 7 军
6 4 0 9 部队：陆军第 2 0 军
6 6 4 5 部队：陆军第 3 1 军
6 6 1 6 部队：陆军第 8 4 师
6 7 0 3 部队：铁道兵第 1 1 师
6 0 1 1 部队：陆军第 7 6 师
6 9 0 0 部队：陆军第 4 7 军
6 9 7 5 部队：陆军第 5 5 军
8 1 7 2 部队：陆军第 1 军
7 2 5 0 部队：空降兵第 1 5 军
8 1 3 3 部队：陆军第 2 1 军
8 0 6 1 部队：陆军第 5 5 师
7 8 4 8 部队：陆军第 5 0 军
7 7 8 8 部队：陆军第 5 4 军
8 8 1 5 部队：铁道兵第 5 师
7 5 5 7 部队：陆军第 1 3 军
7 6 1 1 部队：陆军第 4 9 师
7 5 9 1 部队：铁道兵第 1 师

（余汝信整理）

~~~~~

## 【研究动态】

注意和警惕来势不小的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潮

• 阎长贵 •

关于什么是文化大革命以及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专门做过一个决议，这就是 1 9 8 1 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虽然不是专门谈文化大革命，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却是中心和主线。它关于文化大革命做出了许多科学论断，诸如：

（一）“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或社会进步。”这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既不是也不可能是政治革命，同时，不是也不可能是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它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完全错误的，对它要彻底否定，也就是全面否定、全盘否定或完全否定。

（二）“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由于“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或社会进步”，“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无数事实证明了和继续证明着这个结论。

（三）“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这也就是说，事实也这样，没有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战略举措”不是毛泽东做出和首肯的。

（四）“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

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和破坏。”“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这也就是邓小平、陈云反复说的文化大革命未能防止的原因。

如此等等。《决议》提出的许多科学论断极大地统一了人们的思想，也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当然，《决议》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做的，迄今已经25年，形势和人们的认识与思想状况有了很大变化，勿用讳言，《决议》肯定也有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地方，用句时髦话说，《决议》的内容也要“与时俱进”。比如，《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即：“‘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我们认真想一想，这个“定义”是否十分正确和完全科学？对“反革命集团利用”一语，人们常常发问：“究竟谁利用谁？”尽人皆知，这个所谓“反革命集团（？）”，不是文革前就有的，而是在文革过程中产生和形成的。我觉得，对《决议》中的一些问题和论断仿佛是可以商榷和讨论的。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决议》“与时俱进”，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在对《决议》的态度和看法问题上，不论在党史界，还是整个思想理论界（以及政界），似都存在着分歧。除了有人认为《决议》已尽善尽美外，党内外、国内外，都还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和观点，一种就是，在《决议》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发掘和研究新材料、新问题，做出新论断，或发展和完善已有的论断，也就是使《决议》的内容与时俱进；一种就是，认为《决议》搞的是“非毛化”，是贬低和否定毛泽东，《决议》不正确——说得客气点，也就是在《决议》的基础上往后退。我在题目中说“注意和警惕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潮”，所指，就是这种情况，这种现象。

我这样说，是不是信口开河？任意诬人？那就让我们从互联网上以及报刊上列举一些观点看看。

——文革是“更深入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

有人在《毛主席给中国人民的丰功伟绩大纲！》的文章中说：

“从二十世纪50年代初开始，他（指：毛泽东一笔者）率领中共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原则的纯洁性同苏修领导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1963—1965年，开展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6—1976年为了更进一步的教育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和后人（反资，防修），他又率领着中国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知识青年进行了更深入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在这段期间经济建设也取得了不断的进展。”

——文革是毛主席留给人民的粉碎国内外资产阶级和平演变的“法宝”

一个叫做和尚的人（据说是一个24岁的青年人）2006年8月14日在毛泽东旗帜网

上发表《无产阶级胜利的法宝——纪念毛主席逝世三十周年》的文章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两个伟大的实践和理论是毛主席留给人民的两大法宝，克敌致胜的两把宝剑。”该文具体论述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六十年代，面对中外赫鲁晓夫、大小蒋家王朝、美日法西斯软硬兼施，和平演变的阴谋，国际反共浪潮，国内经济困难，党内走资派的呼应，毛主席和中国人民没有屈服，进行了勇敢的斗争。那时，真是黑云滚滚，大地微微。虽然经过与国际修正主义的论战，国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但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毛主席怀着‘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的坚定决心，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目的是为了找到一个能粉碎国内外资产阶级不战而胜阴谋的方法，探索一条如果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真正的共产党员和人民重新夺回领导权的途径。”

——文革成功阻止了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复辟

有人在《江青的革命精神万岁!》（作者：东方战士，属国际主义者运动委员会）的文章中说：

“……1991年6月5日，中国公布了江青的死讯。被反动政权在15年的囚禁后在十分可疑的环境下告别人间。江青是一个活着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标志。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在1966年在中国发动的有亿万工农和革命知识分子参加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群众运动。在那场波澜壮阔的运动中，江青，与其他毛泽东的卓越的追随者，敢于领导人民同党内的当权派做斗争，这些当权派，一直试图把社会主义中国变成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长达十年的史诗般斗争中，严禁群众进入的大本营被摧毁，无产阶级培育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的萌芽。江青处在这些大跃进的最前沿。……在毛泽东的领导和支持下，江青和她的同志们在十年里成功阻止了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复辟。”

——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不断地进行文化大革命

高尚全在2006年第9期《炎黄春秋》发表《深化改革是中国的唯一出路》的文章中说，有一位一开始就对改革持怀疑态度的同志提出，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不断地进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不是一次、二次、三次、四次，而是七、八年一次地多次进行”。文化大革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主要是资产阶级叛变”，把矛头直指邓小平同志。

——文革对工农兵来说不是灾难，而是“解放区明朗的天”，“快乐的节日”

名叫和尚的作者在《无产阶级胜利的法宝》中说：“斗私批修，反封，反资，反帝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确实是一场灾难；但对工农兵，那是解放区明朗的天，翻身的好日子，战斗的洗礼，快乐的节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胜利万岁

在2006年9月1日的毛泽东旗帜网上有一篇题目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号角——毛主席领导批判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的文章，完全袭用文化大革命的语言，什么“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等，做了一篇可以同文化大革命大批判文章媲美的文章，最后高呼：“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胜利万岁!”

——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在2006年9月9日的毛泽东旗帜网上有一篇题目叫做《牢记“两件大事”——致毛泽东寄予厚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们》的文章，其中说：“与毛主席有亲缘关系的人，与毛主席有历史渊源的人，毛主席寄予厚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们，尤其有责任、有义务牢记毛主席的‘两件大事’、继承毛主席未竟的革命遗志——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同所有剥削阶级的制度、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

——“文革浩劫论”是代表国际资产阶级与被消灭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政治倾向

周泉纁在2006年12月出版的《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一书中说：“关于‘文革浩劫论’，一般地讲，在倾向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人们中比较流行。‘文革浩劫论’认为文革是类似二次大战那样的浩劫，是毛泽东反人权、反民主、反现代化的思想和相关的社会体制必然导致的大动乱大倒退，文革不存在任何历史的合理性。‘文革浩劫论’实际上代表了两极冷战时期国际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政治倾向；或者说代表了经济上被消灭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政治倾向。”（第2页）

——华国锋叛变革命，叶剑英、邓小平篡党夺权

在2006年9月3日的毛泽东旗帜网上有一篇题目叫做《重温教诲，继承遗志，革命到底》的文章，其中说：“毛主席逝世不久，华国锋就叛变了革命，搞了宫廷军事政变。华国锋是个窝囊废，叶剑英、邓小平几个回合就把他打入了‘冷宫’，真正实行了篡党夺权，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了个反其道而行之！此后的所作所为，就是走资派按他们的世界观行事的问题了。”

——《历史决议》否定文化大革命，对人民实行反攻倒算

在2006年9月19日的毛泽东旗帜网上有篇题目叫做《网络红卫兵的英姿与主流精英的嘴脸》的文章，其作者和尚说：“三十年前，当无产阶级沉浸在失去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悲痛之中，思想还没有完全清醒，一小撮阴谋家、走资派乘机发动政变，篡夺了领导权，开始了有步骤的资本主义复辟。打着‘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一表面正确，其实抹杀了真理阶级性的错误口号，否定了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六中全会，制定《历史决议》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人民实行疯狂的反攻倒算。紧接着又打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红旗，搞了不分白猫、黑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资本主义改革开放。……”

——文革被敌人反对是好事，不是坏事

名叫和尚的作者在《无产阶级胜利的法宝》中说：“毛主席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一件是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这两件事，毛主席在时，大多数中国人拥护并赞成，今天拥护和赞成的人，连话语权都没有了。”又说：“毛主席一生做的二件大事，当时就有人反对，今天依然有反对的人，其实被敌人反对是好事，不是坏事。”

——走资派从毛主席生前“永不翻案”到毛主席走后否定文革

名叫和尚的作者在《无产阶级胜利的法宝》中说：“毛主席在时，走资派假惺惺发誓说：‘永不翻案’。毛主席走后，走资派阴谋上台，迫不及待的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宪法给予人民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罢工自由，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可见毛主席一生做的两件大事，击中了内外反动派的死穴，打到了新老走资派的要害。”

## ——文革不能完全否定

国防大学资深教授林蕴晖在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2006.6.12—19)上分上、中、下三次发表了《陈云谈“文化大革命”未能避免的原因》，有个网站连续发文批判这篇文章，有篇文章的题目可能叫做《〈学习时报〉再也不要给党史抹黑了》(记不清了)，又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未能避免？一评〈学习时报〉林蕴晖的谬论》。

该文说：“在有关的文章中看到，有人完全从否定文革的前提出发，提出：文革之所以不能避免是因为当时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毛泽东搞个人专断，使不同意见的领导人不敢讲话。例如，近几期《学习时报》(2006年第339、340、341期)连载的林蕴晖撰写的《陈云谈‘文化大革命’未能避免的原因》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作。”

## ——文革发动是当时党内大多数人的意见，没有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

评林蕴晖“谬论”的文章说：“该文(指林文一笔者)引用某领导人的一个个别谈话，说毛泽东的主要错误是‘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着重写这个，其他的可以少提。’从而得出结论说：‘不管毛泽东的意见正确与否，其他领导人的不同意见都只有检讨的份。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就是维护大局，就是维护党的利益。’因此使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行为不能被制止。”“把这样一个重大、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地看成是毛泽东搞个人专断、一意孤行的结果，视庐山会议后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中央领导集体之间关系不正常，这种观点我认为是十分浅薄和平庸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文革的产生，有其复杂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原因，从根本上说，它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党的思想政治路线决定的，是当时中国的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产物。从组织上看，毛泽东发动文革经过了一个酝酿、讨论过程，已经形成了当时党内大多数人的意见，并没有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开展文化大革命虽然是毛泽东的主张，但从组织上却是党中央领导集体作出的决议。人们知道，1966年作为开展文革标志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就是在刘少奇主持下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的。同时会议还决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及其搞的‘二月提纲’。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在中央书记处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追认和决定。这种决定虽然在后来被认为是错误的，但在当时却是集体作出的。从组织上并未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 ——文革十年工农业都有巨大进展

有人在《毛泽东时代的27年经济发展的历程》的文章中说：

“毛泽东在他任内对国家经济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实在太伟大了。”“经过27年的高速工业化，中国成功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到了1975年，这个比率完全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倍。即使1966年后的十年期间，从1965年的1402亿元发展到1976年的3207亿元。这样的高速增长居然被第‘二’代领导人和所谓的精英经济学家贬为‘停滞不前’，‘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还有人在《毛主席给中国人民的丰功伟绩大纲!》中举出统计材料，说：“从‘文革’后国家统计局统计的经济数字看，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

## ——四大和文革是政治昌明的生动体现

有人在中央电视台关于唐山大地震的节目中，说了这样一句话：“那是一个灾难年代的最后一个灾难。”有个名字叫做“宁可抗日死”的作者专门写了一篇《“狗腿”专家称毛泽东时代为灾难说明了什么？》的文章批判这句话，说：“就这么一句话，把整个节目的气氛都给破坏了……我不知道央视要找这么一个人上节目，究竟要传达给观众什么思想观念。”

作者评论道，说这个话的人，“他那时也许是一个右派，或者是一个反革命分子，或者是一个恶霸地主或资本家的后人等等之类，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批判的对象，或是因此而受牵连的对象，如果这样，在他个人的眼里，得出那个时代是一个灾难的年代的结论，也许就不奇怪。但是，尽管如此，他这个结论仍然是一个偏执的片面的缺乏起码的公正客观的充满诬陷的结论。”

作者接着说：“毛泽东时代在绝大多数人眼里，究竟是一个什么时代呢？那是一个充满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互相关心的，社会公正公平的，和睦和谐的时代，是一个政治文明（四大和文革，就是政治昌明的生动体现），科技发达（毛泽东时代是中国有史以来取得科技成果最为丰硕的时代），文化进步（毛泽东时代的各类文艺作品堪称精品无不给人民给社会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工业兴旺（在70年代中期，周总理就庄严宣布，中国已经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面对这样一个时代，人民大众是绝对不会称其为灾难年代的。”

## ——刘少奇不是“被迫害致死”，死时寿命超过当时中国人均寿命

有个叫做老田的作者在《文革中间的“政治迫害”和四人帮的历史责任问题》的文章中说：“说刘少奇是‘被迫害致死’，把这个政治上的‘迫害’词汇转换成法律术语就意味着‘谋杀’，这是典型的政治栽赃手法，刘少奇被平反这么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发现或者披露杀害刘少奇的凶手和有关犯罪事实。而根据最权威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刘少奇传》，刘少奇是死于多种疾病的长期折磨，死时的寿命已经超过当时中国人均寿命了。1969年10月进行战备疏散，刘少奇被专机送到开封之后，还有北京的医生同机抵达，随同救护，而且是在教会驻军医生对刘少奇的抢救方案之后，北京的医生才离开。如果这个传记没造假的话，那么刘少奇临终前显然是享受到远远高于普通人的医护水平，完全不存在任何‘迫害’和‘谋杀’情节。”

## ——江青同志是纯洁的、高尚的、勇敢的革命者

有人在《纪念江青同志》的文章中说：“我是个年轻人，没见过江青同志，也没有读过她的任何一篇文章。”但这并不妨碍我纪念她。他说：“我想告诉人们，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曾有一个女性用她火热的激情、动情的演说、正大光明的斗争，来维护毛泽东思想，来捍卫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在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受到危险时，她是那样的勇敢，让所有的曾经热血的男人们感到羞愧，也让那伙人感到烫手。但除了她，没有第二个！”

## ——张春桥同志永垂不朽！

在“乌有之乡”网上有个名叫扞虱雄的人写的《张春桥，你没有死！》的文章，其中说：“张春桥在‘四人帮’中的名声是最好的，他的理论功底非常扎实，绝不是那个‘解放反动思想，实事求是’的历史垃圾所能相比的，尤其是那篇让张春桥名声大噪的《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一文，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历史高度的指导性文章，我们从这篇雄文中完全可以感受到张春桥的横溢才华和革命激情。”又说：“张春桥死了，可张春桥的精神没有死，张春桥



的理论仍然是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强有力武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尤其是工农群众，和开历史倒车的‘改革者’们进行最坚决的阶级斗争！直至在中国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专政，直至到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文章最后高呼：“张春桥同志永垂不朽！”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名叫和尚的作者在2006年9月12日的毛泽东旗帜网上发表他9月9日写的《三论无产阶级胜利的法宝——纪念毛主席逝世三十周年》，其中说：“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和经济成果，同时继续革命。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白骨精散发的妖气就会毒害人民，侵蚀共产党的机体。三十年群魔乱舞，乌烟瘴气告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早应该搞了，而且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七、八年再来一次。”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和平演变后果惨”，“工农大众再扬鞭”

林伯野为《纪念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写了两首律诗，其诗云：

伟人辞世三十年，遗训金光久愈鲜。  
主要矛盾抓道路，中心工作防和演。  
两极分化决策误，一意走资方向偏。  
革命长征应继续，工农大众再扬鞭。  
伟人辞世三十年，世事沧桑证预言。  
三论当权方向改，和平演变后果惨。  
走资权贵千般富，劳动人民万事难。  
唤醒群众闹革命，继承遗志保江山。

就列举到这里。请大家看看，这些观点符合《决议》的精神吗？符合实际吗？我认为，不符合《决议》精神，特别是背离人们（特别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众所周知的事实和经历，说得明白点或客气点，是说假话，是拉着《决议》往后退。不仅如此，还要“今日欢呼孙大圣”，“工农大众再扬鞭”，即再次进行文化大革命。而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大都表现得理直气壮，气势汹汹，并搞人身攻击。我在题目中说“来势不小”，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出现这些观点，出现这种思潮，是有原因的。一是几十年来，我们总是把文革作为禁区，不准揭露和批判它；二是现实中有许多严重问题，如贪污腐败，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等等。认真解决这两个问题，对化解和消弭这种错误思潮，可能是有用的和必要的。

文化大革命发生已经40年，结束也30年了，已经成了真正的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进一步研究它，讨论它，仍很有必要。任务艰巨。“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这种现象不正常。我们中国人，特别是研究党史的人，包括办党史刊物的人，有责任、有义务改变它，让“文革学”在中国也兴旺发达起来。而关键又在于中国公民要真正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利！对文革的回忆和研究设禁区，是历史性错误，是误党误国之举。“秉笔直书”是中华民族修史的优良传统，而“忏悔”却是中国人比较缺乏的意识。研究和讨论文革问题，要本着事求是的原则，讲真话，不讲假话，“和而不同”，“百家争鸣”。让文革这种“灾难”和“浩劫”不再在中国重演，这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这是中国广大人民的深切愿望。我们的责任重大啊！

~~~~~

【往事回首】

江青在钓鱼台居住时的一些情况

• 杨银禄 •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后，陈伯达、江青及其他文革小组成员陆续搬进了钓鱼台办公和居住。陈伯达住15号楼，江青住5号楼。

◇ 江青患病

江青患有比较严重的植物神经失调病症，对声音特别敏感。1966年底，她觉得5号楼距离马路太近，车来人往不够安静，就提出搬家的要求。经过认真挑选，她选中了11号楼，很快就搬了过去。11号楼距离马路较远，周围环境也较幽静。

1968年秋冬之交，江青患了一次重感冒，发高烧，体温在38℃以上，几天高烧不退。看得出她非常不舒服，整天坐卧不宁，烦躁不安，出大汗。

病中，江青想见毛主席。

有一天，她叫我打电话给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她说：“让他立即报告毛主席，就说我现在的病情很严重，几日高烧不退，身体极度虚弱，请主席赶来钓鱼台看看我，否则，就可能见不到主席了。”

徐业夫将江青的请求报告了毛主席，主席既没有表示去钓鱼台，也没有表示不去，没有说话。

江青焦急地等待着，等了两天，实在忍不住了，叫我再次打电话，“让徐业夫问问主席何时能来钓鱼台看我”。徐业夫在电话里说，他不好催促主席，等一等再说吧，并答应过几天他再提醒一下主席。

大约过了两周，江青的病完全好了，吃饭、睡觉、工作都恢复正常了，毛主席才从中南海来到钓鱼台看望江青。毛主席虽然来得晚了一些，但是，江青还是很高兴的，从二楼下到一楼迎接毛主席。那个时候主席的身体很好，毫不费力地从一楼爬到二楼，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江青高高兴兴地把主席送到汽车上。

回到楼里以后，江青又回到二层，把主席没有吸完的雪茄烟分给工作人员，叫我们留作纪念，并说：“你们会吸烟的同志可以吸嘛！”她平时最讨厌身边的工作人员吸烟，这一天她一反常态，说：“你们吸吧，今天开戒啦。”

年底，江青患了牙病，牙龈肿胀，发低烧，她把毛主席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叫到11号楼。李志绥与她商量服一种消炎止痛药，她同意后服下了。可能是药物过敏，两个小时以后，大腿内侧长了一些小疙瘩，觉得发痒，精神紧张得很，如坐针毡。她发怒了，在走廊里大声斥责李志绥：“你给我服的是什么屁药！为什么长了这么多疙瘩？这样瘙痒？如果这种东西控制不住，再继续发展的话，我就有生命危险啦！一切后果由你李志绥负责！”她停顿了一下，不假思索地嚷嚷：“据说你过去曾经给国民党的大官看过病？我看你就是国民党的大特务，你今天是有意残害我的！你如此对待我，绝没有好下场！你滚吧！”

那时，李志绥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吓得一动不动，一言不发，面色苍白，江青叫他“滚”，他就低着头走了。

三天以后，江青的牙龈消肿了，不疼了，小疙瘩也没有了。病虽然好了，但是，江青对李志绥还是耿耿于怀，将她服药、长小疙瘩的事报告了毛主席，说她怀疑李志绥是国民党的特务，请主席警惕他的行动，建议主席把他从身边赶走。

毛主席不以为然地说，他是一个医生，给谁看病都是应该的、正常的，国民党的大官也是人嘛，有了病也得看医生。他给国民党大官看病，那是他的职业，难道给国民党的大官看过病的医生就是特务吗？就不能给共产党的大官看病吗？不要乱怀疑嘛，你不用我用嘛。

从那以后，李志绥特别害怕江青，听说江青要到毛主席那里去，他就会早早地溜走。实在溜不掉与江青碰到一块，他便会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头都不敢抬。

◇ 江青第二次调楼

1968年下半年，江青看了一份介绍苏联情报机关克格勃的资料以后，便怀疑起11号楼也被安装了窃听器。于是，她马上分派她信得过的人在11号楼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进行搜查。查了几天，自然是一无所获。但江青仍然不放心。再加上秋冬时节她又得了上面说的那场病，就开始讨厌11号楼，产生了再次搬家的念头。

一天，江青对我说：“小杨呀，我不想在这栋楼继续住下去了，我总怀疑11号楼有窃听器，觉得不安全，这算是第一个原因吧。第二，这栋楼离12号楼太近，如果主席来12号楼办公或休息的话，我怕影响主席。第三，我看10号楼比11号楼大一些，房间可能多一些，到了10号楼我可住在一层，以后不再费力地爬二层了，况且10号楼离9号楼近，我和春桥、文元同志研究工作也比较方便。你给总理打个电话，把我的想法跟总理说说，如果总理同意我的意见，你再给东兴同志打个电话，请他派人到10号楼仔细检查检查，看有没有安全隐患，检查完了，再用紫外线消消毒。一切都搞完了，我再搬。”

周总理对江青非常了解，他接到我的电话，立即就答复了：“好嘛，江青同志的想法是对的，我同意。我现在就给东兴同志打电话请他准备一下。江青同志还有什么要求吗？”我说：“江青同志说要检查一下楼的安全情况，然后再用紫外线消消毒，别的没有提什么要求。”周总理说：“那好嘛，我请东兴同志办。”

我把总理的意见报告给江青，她非常高兴，提出马上到10号楼去看看。我说：“那栋楼好几年没有住人了，可能很脏了，等打扫好了你再去看好吗？”她说：“不碍事，我现在就去。”我忙说：“请江青同志等一等，我请钓鱼台的领导把10号楼的钥匙送来，叫他们在那里等，不然咱们进不去呀。”江青说：“那好，还是你想得周到。”这是江青第一次表扬我。

等钓鱼台管理处的处长张振良和一位对10号楼熟悉的服务员到了那里，我和警卫员就陪同江青到了10号楼。那位服务员把所有的套间打开，请江青看。江青看后非常满意。

根据江青的要求，对10号楼全部整理完后，她于1969年春节前就从11号楼搬到了10号楼。

◇ 林彪贺新居

江青搬到10号楼的第二天，林彪和叶群到10号楼来看望江青。他们来到10号楼以后，没有进会客厅，也没有进江青的办公室。林彪可能是累了，一屁股坐在楼厅的沙发上不动了。江青和叶群见状就坐在林彪的左右。江青首先开口说：“欢迎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来看我。”林彪坐在那里只是微笑，默不作声。叶群却很活跃，她探过身子，笑着对江青说：“今天林彪同志和我来是祝贺江青同志乔迁新居的。林彪同志知道江青同志搬到新住处非常高兴，他祝江青同志身体健康，说江青同志身体健康可以为党为人民多作贡献，也是党和人民的福气。”林彪还是不说话，只是点点头。叶群继续说：“我看这栋楼房很不错，面积比较大，活动方便，空气比较好。如果天气不好，外边散步不方便，江青同志可以在楼里散步。江青同志刚搬到这里来，可能还不太适应，住久了就习惯了。江青同志如果觉得楼房内外有什么地方需要改造的，我叫邱会作（总后勤部部长）给你办。”江青说：“谢谢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的关心，林副主席身体也不太好，天气这样寒冷，还来看我。请林副主席保重身体。现在楼房不需要修理，以后如果需要的话，再麻烦你们。”叶群说：“请江青同志千万不要客气！”

林彪和叶群专程来10号楼向江青贺新居，江青表现得还是蛮高兴的。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刚刚离开10号楼，江青就非常严肃地对我说：“小杨，你记住，从今天起，我和毛家湾（林彪住地）的来去电话都要写出详细的电话记录，电话记录都必须经过我过目，并妥善地保存好，留作证据，否则将来我说不清楚，你也说不清楚。”

那个时候，党的九大还没有召开，他们之间正是互相保护、互相吹捧、互相抬举、互相利用的时候，江青为什么对毛家湾产生了戒心，直到今日我也没有搞清楚。

为了将来说清楚和林彪之间的来往，江青叫我保存电话记录，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从我保存的几十份电话记录看，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一般的，是密切的，是相互利用、相互吹捧、相互关心的，当然也相互有戒心。

◇ 江青在钓鱼台修防空工事

1969年10月中旬，中央发出通知，为了防范苏联利用中苏边境谈判之机对我国进行军事进攻，立即加强战备，于10月20日之前把在北京的老同志全部疏散到外地。留在北京的最高领导人只有周恩来总理。为安全考虑，周总理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住进了北京西山，江青也一同住进了西山。为了体验在防空设施里的感受，江青钻进防空洞呆了十几分钟，就感觉缺氧不舒服。她在西山住烦了，11月7日下午回到钓鱼台，专门看了17号楼的地下室。江青在钓鱼台住了一个晚上，又匆匆回到西山，并叫我打电话让中办警卫局二处把17号楼的地下室改建成永久性的坚固的防空设施。中央办公厅为此写了专题报告，并做出设计方案，经周总理批准后，修建工程随即开工。工程竣工后，江青亲往检查，表示很满意，还陆续就防空设施提了一些要求，例如在防空工事里存放一些压缩饼干、腊肉、腊鱼片，急救药棉、棉签、纱布、酒精、碘酒、小手术器具和缝补衣服的针线等。

1970年2月初，江青又提出，在10号楼建一个坚固的防空洞，经请示周总理批准，很快建成了，还在里面安了床铺，备了和17号楼地下室一样的食品、药品等。江青还钻下去检查，凡她不满意的，都进行改动，直到她满意为止。

◇ 江青防地震

1970年一二月间，传来北京周边地区可能发生地震的情报，江青敏感的神经又紧张起来。有一天，江青严肃地对我们说：“保证我的安全是你们的责任，是党中央、毛主席交给你们

的任务，对我的安全问题，不能有任何闪失，要做到万无一失。如果我的身体、生命受到损害，党和人民就受到损失。为了防震，保证我的安全，你们要想想办法，不用我替你们操心吧？我建议，在我的卧室、办公室、客厅等经常办公、休息和活动的地方，搭建牢固的防震架，摆上救命的物品。我限你们在三天之内搞好，还不能干扰我的工作、休息和生活。”

我们首先把她的意见报告了汪东兴，然后再找人进行研究，准备好材料、车辆和人员，等着她出去开会的时候立即动手。一天晚上，她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会议，我们用两三个小时就把活干完了。在她的卧室用粗大坚硬的方木搭了大架子，还把四根柱子牢牢固定在地板上；在她的办公室和大客厅摆放了坚固的桌子和红木的条案，如果发生地震，她可以立即钻进去，暂避一时。

江青开完会，看了电影，回到10号楼，对我们采取的防震措施表示满意。第二天她起床后，又把我叫去说：“光采取防震措施还不行，如果地震发生了，你们还得把我转移到安全地方去，你们要练习如何背我、抬我。你把我身边的工作人员集合起来，我现在就看你们练习。”

我把工作人员叫到楼厅，江青坐在沙发上看我们男背女、女背女的练习。练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江青满意为止。个个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

◇ 江青学开车

在西山躲避战争的一天，江青正在看文件，打铃叫我。她对我说：“小杨，现在的国际形势很紧张，苏联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性随时都会发生，他们的战术很可能是首先对我们的首都进行大规模的空袭，然后是装甲部队的大举进攻。我们的军队虽然在‘三北地区’（东北、华北、西北）做好了战争准备，但是，现在的战争是残酷的。咱们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例如学会急救，包括包扎、涂药、人工呼吸，对伤者进行转移等。更重要的是学会开汽车，我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要学会，我自己也要学开车。你今天就召集大家开个会，进行动员。都要行动起来，你首先带个头。学开车不能影响工作，你们要在休息的时候学。咱们都会开车了，如果遇到敌人袭击，司机被打死了，警卫员开起来就跑了；如果警卫员又被打死了，秘书开起来就跑了；如果秘书又被打死了，护士开起来就跑了；如果你们都被打死了，我自己开起来就跑了。这样，我们增加了逃生的机会。坐以待毙是不可取的，也不是我江某的性格。”我说：“我们一定要按照江青同志的指示办。”她说：“那好，你们要把学开车当作政治任务去完成。”

我把江青的意见报告汪东兴，他也很支持，并告诉警卫局交通科科长曹志秀给我们准备一辆教练车。

曹科长很快给了我们一辆苏制的旧嘎斯六九。这辆车开到西山以后，我是第一个学的。我的师傅是警卫局二处司机王自开（他后来给董必武同志和华国锋同志开过车），他把车开到香山停车场，教我挂挡、起步、刹车、转向、换挡。他教得耐心，我学得认真。两个月以后，我就拿到了正式的驾驶执照。以后，其他工作人员都相继学会开车了。

江青正式从西山回到钓鱼台以后，马上提出也要学开车。这件事，可叫我们犯愁了，怎样才能保证她的安全呢？叫她学吧，万一发生一点点问题，如何向党中央、毛主席交代？不叫她学吧，谁能说服她？我们知道，她想干的事，非干不可，任何人也拦不住——这就是江青的性格。我就把这件事报告了汪东兴，他更了解江青的性格，答复：“那就叫她学吧，你们要想办法保证她的安全，不能出任何差错。”

江青要求学开车，组织上又同意了，具体工作还是由我们来办。用嘎斯六九当她的教练车

肯定不行，挂挡、起步、换挡这些活儿她干不了。只能用自动换挡的红旗轿车。为了保证安全，我们和警卫局汽车修理厂的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想出一个好办法，就是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安装一个辅助制动器，在紧急情况下教练员也可以采取刹车措施，以防止碰撞。经过试验，效果不错。训练场地定在钓鱼台院内，因为那里院子大，车辆少，人员少，道路平坦。

江青学车的教练员是她的司机李子元。

江青第一、二次学开车，比较小心谨慎，也能够听从教练员的指挥，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第三次开车，她的胆子比第一次大多了，油门也加大了，车速快了。教练员几次提醒她开慢点，她可就不怎么听了。在17号楼西侧由北向南行驶到10号楼路口时，向右打轮往西拐弯，她既没有减速，也没有收油门，拐过去后来不及回轮。这时，她慌了神，手忙脚乱地加大了油门。教练员一边踩辅助制动器，一边帮她回轮。一个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的柔弱女人，不知道那时从哪儿来了那么大的劲儿，李子元硬是没有把方向盘转过来。汽车一下子就上了30度的土坡，撞到一棵杨树上才停下来。车前的大灯、小灯全撞坏了，机器盖也鼓起来。一辆很好的大红旗轿车撞成那个样子，她毫不心疼，从车上下来，看了一眼说：“不碍事，没有关系，我还学。”嘴上虽然说得轻松，但事实上她害怕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提学开车的事了。

◇ 江青让张、姚、王陪她“看电影”的风波

1973年6月11日晚上，江青叫我请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陪她到17号楼看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王洪文说晚上有事不去看了，张春桥、姚文元说这部电影看过了，也不去看了。当我把他们的回话报告给江青时，她就不高兴了。带着一肚子气，她独自看了大约半个小时。她越想越有气，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就霍地站起来，气冲冲地跑到9号楼质问张春桥、姚文元到底看过没有看过那部电影。老奸巨猾的张春桥看到江青来势不对，就撒谎说：“我没有看过呀。”姚文元也见风使舵说：“看没看过我不记得了。”江青对他们的回话半信半疑，于是就命令她的警卫员到放映室查看登记本。查的结果是张春桥、姚文元均已看过，江青知道他们撒了谎。但当着大家的面，她对张、姚又能说些什么呢？虽然不高兴，又不能对他们怎么样，于是，她恼羞成怒，大发雷霆，迁怒于我和警卫员，诬蔑我们谎报军情，犯了“欺君之罪”，有意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三个人跑到中南海西花厅，逼着周总理把我们立即关进监狱。要不是毛主席、周总理和汪东兴同志的保护，我们的下场可就惨了。

◇ 钓鱼台的霸主

那个时候，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江青经常用的东西，别的中央领导人就不好用、不能用、不敢用。如果用了，叫她知道，她就会不高兴，甚至发作出来，弄得大家都很不愉快。

钓鱼台当时共有18栋楼，其中两栋是工作人员用房，一栋是综合活动楼，其余的15栋是接待楼。江青一个人就住过三栋接待楼，还霸占着综合活动楼，再加上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住在里面，所以有人说，钓鱼台的南半部是一个禁区，江青是钓鱼台的霸主。我认为这种说法是贴切的。

江青不但长期独占着两栋楼，还有4匹马长期供她独用，即使是到北戴河休息，去八达岭游玩，马匹也上专列与她一同前往。放映厅的近百部电影片，由她一个霸占着，没有她同意谁也不敢拿出去看，包括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和叶剑英在内。

江青在钓鱼台散步时，如果有汽车经过，司机在很远的地方看到江青散步，就会立即停车、熄火，静静地等待江青走过去；如果行人发现江青，会立即绕道避开，如果无道可避，就会往回走，不能也不敢和江青碰面。

江青处处以毛主席夫人自居，总想自己说了算。她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陈伯达是组长，她却高居于组长之上。讨论起草九大的政治报告时，有一次江青公开跟陈伯达大吵，当着中央文革碰头会其他成员的面，对陈说：“我看不起你！”并在陈的面前狠狠摔了一个水杯。在那次会上，张春桥、姚文元没有说话。会后，她把张春桥、姚文元叫到10号楼，批评了他们在关键时刻不坚持原则立场，不帮她说话。他们回去以后，给江青写了检讨并恭恭敬敬地到10号楼递给江青。

◇ 所谓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事件

1968年3月初，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群众组织，请求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写信给党中央，称收藏在馆内的部分鲁迅手稿不见了，并提到戚本禹曾从文化部取走这部分手稿。3月5日晚，江青要傅崇碧过问此事。

傅崇碧经过周密调查，查清楚了结果：江青于1967年1月，派戚本禹和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韩树信取走了鲁迅手稿，当时还开了收条，将4箱手稿交给了文革小组保密员卜信荣保管。

3月8日，傅崇碧带着卫戍区的副政委周树青、秘书冯正午到钓鱼台向江青报告手稿的调查情况。两辆汽车到钓鱼台东门，傅崇碧找江青没有找到，就和文革小组值班室联系，值班室报告办事组组长李讷，李讷没有明确表示。于是，他们就给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打电话，得到同意后进入钓鱼台。在16号楼前恰遇姚文元，他们便一起进了楼。

不知江青怎么知道的，叫上我，就从11号楼风风火火地赶到了16号楼。

江青一进门就大声吼道：“傅崇碧，谁叫你进来的？你带这么多人到这里来干什么？你到这里来要抓人吗？你懂不懂纪律？……”

当傅崇碧解释是陈伯达办公室批准进来的时候，江青质问：“陈伯达在哪儿？办公室哪一个？陈伯达批准的也不行，因为这件事是我叫你调查的，你为什么不请示我？你身为卫戍区司令，不经我允许就进来，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我们要抓人啦！”

傅的秘书冯正午，没有见过这种阵势，一刺激，紧张得晕过去了，手中的公文包随即掉到地上。

这时，江青高喊：“他拿皮包打我！”当时，傅崇碧很冷静地说：“江青同志，我是来汇报鲁迅手稿的事情的，这是你交办的，现在已经查清，手稿和保管手稿的人，都在中央文革小组。”

江青故作惊讶地说：“什么？这不可能！”周树青当即从皮包里找出写有收管手稿人签字的条子，交给江青。江青接过条子看了以后，立刻把卜信荣找来，后又搬来装有手稿的4个箱子，打开箱子，江青亲自翻看后，对卜信荣喊道：“你是个大坏蛋，不是毛主席的兵，把他抓起来！”卜信荣急得满脸通红，连声高喊：“冤枉！我冤枉啊！”江青根本不想听卜信荣再解释什么，只是重复一句话：“把他抓起来！”就这样，卜信荣就被莫名其妙地逮捕了。她又硬逼着陈伯达把秘书王保春调离钓鱼台。其实，按规定，中央领导人的秘书是有权批准有关人员进入领导人住

地的。

3月9日晚上，江青在钓鱼台16号楼召开会议时说：“傅崇碧带人、带枪闯钓鱼台16号楼中央文革小组，行为可疑！他的秘书皮包里装了几支手枪，并用皮包击打我的腰部，企图打断我的脊梁骨！”姚文元在一旁随声附和作伪证。

江青不愧是一个名演员，会演戏，越演越像。我是在场的见证人之一，事情根本不像江青说的，但是她居于高位，又是一个特殊人物，权势巨大，当时不少高层领导人惧怕她，对于她的话岂敢不“非常重视”？

3月10日，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汪东兴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单位有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中办警卫局等。会上又讲了傅崇碧进钓鱼台的问题，并规定了七条：一、任何人进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京西宾馆、国防部大楼都要事先打电话报告，经批准后方可放行，而且必须是首长批准，秘书和警卫批准不算数；二、被批准进去的人只能是本人，其随员不得进到院里楼内；三、被批准进去者到指定的会客地点等候，不得乱窜；四、送文件的通讯人员，不得直接送到首长住房（办公室），信件要经过中办秘书局转递；五、不管任何人的汽车，进入这五个地方时，哨兵不仅要认车，而且要认人；六、任何人进入首长住地时，不准携带武器和危险物品；七、今后中央开会时，不准送文件到会场。这七条规定是杨成武代表与会领导归纳并宣布的。

◇ 江青命令：不许黄、吴、李、邱进钓鱼台

林彪、叶群等摔死在蒙古国境内的第三天（那时“九一三”事件还未公开），江青对我说：“小杨，我今天宣布一条命令，从今天起，毛家湾的人，还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不准进入钓鱼台，你马上报告给汪东兴同志立即执行。”

我遵照江青的指示报告了汪东兴同志，他说：“这件事难以执行，因为这是关系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重大问题，不能随便通知钓鱼台各个大门，这样做会惊动某些人，也会泄密。同时会干扰党中央、毛主席的部署。这些话，你不要跟江青同志说，由我跟她说。江青同志问你时，你就说报告东兴同志了。”

1971年9月24日，中央命令黄、吴、李、邱离职反省，交代问题。从此，江青不准他们进入钓鱼台的命令自然也就没有意义了。

□ 《党史博览》2005. 11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